

引介——

從孫悟空七十二變 談建築的教與學^{注1}

文／曾成德

孫悟空西遊之後究竟變了沒？

曾：你覺得西遊記之後，孫猴子被收服了沒有？

許：沒有。

曾：我也覺得沒有，那為什麼要去走那一遭？

許：其實整個過程，他都在認識他的本性。所謂的緊箍咒，往往只在他要克服他自己時才有作用。我們不能用科學證明唐三藏念經真的能讓緊箍咒作用，但孫悟空的頭痛，對他而言是真實的感受。

曾：所以，所有從西遊記學得的事是什麼？

許：你問我啊？這要問孫悟空啊！

曾：我也覺得西遊記之後，他並沒有變，不過，這也許就像妳說的，他更認識他自己。

一段旅程

小時候去唸書，然後工作，然後回來教書，後來有一些人加入，參與競圖評審，參與蘭花屋，參與移植展覽，從這些旅行中所學到的，主要也是關於我自己，當然也關於建築。整個學習的旅程，一直在克服一些自己的成見、對建築的成見，以及一個社會裡其他一些人加諸在我或建築或其他事情的成見。這是在旅程中最有趣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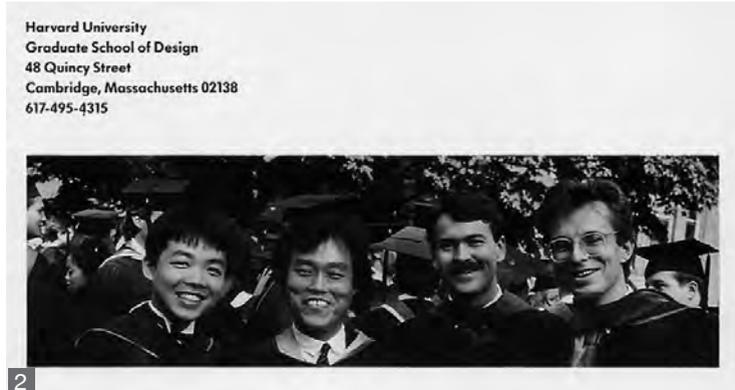
例如，1979年我開始念建築，老實說，從來沒讀懂過《建築的複雜與矛盾》、《紐約五人小組》的論述，尤其不懂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到底在做什麼。但是在我求學時，恰巧是後現代進入台灣的時候，在那些論爭中我們看見的是對形式主義極端偏



曾成德
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1. 1986年 GSD@50 刊載了作者在哈佛留學時期研究展覽作品的情景。
2. 1987年作者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畢業典禮的場景。



見的評論。所有的討論都被極端簡化成在形式上攻擊與讚揚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我們在評圖的過程中被質疑的是現代建築的形式與功能，至於後現代主義，好像就是在形式上反對現代主義。等到我到了國外，才發現整個論爭並非如此，我們沒有辦法在不理解，用范裘利的講法：建築的複雜與矛盾，或者我比較喜歡用的說法：建築的多義（complexity）與歧義（contradiction），這是建立在新批評的文學理論與手法，然後是借用燕卜蘇（William Empson）所著稱的「七種類型的複雜」（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亦譯為：朦朧、晦澀、曖昧、多義等，去討論建築形式語言裡故意不純粹的各種並置。我必須到國外才能發現這點，因為形式主義在台灣是如此被戴上污名的帽子，有多少人只要看到你的東西像後現代主義，就直接說你是形式主義，也不教你這是好的還是不好的，說你是好的，可能是由於你不站在形式主義

那一邊說你是不好的，則是由於你背叛現代主義裡面講究功能和效率這一點。這在當時整個台灣的建築教育裡，可以扭曲成這個樣子。

我到國外後，在那種自由裡面，我發現形式沒有什麼罪惡，事實上把複雜與矛盾帶進來討論，只是注意到意識形態的部分，卻不在設計的操作裡去理解，在建築背後的架構，是關於四、五百年來文藝復興對於建築形式有什麼可能的討論，加上新批評文學理論，還有文化研究的崛起，才使得范裘利有這個機會。這些事情在我念建築時的台灣，即使書已經翻譯成冊，仍舊沒有人告訴我這件事。因此我是在一個壓抑的環境裡，事情被簡化到教我的人用一種意識形態的操作教我，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不接受設計就只用那種方式教或學。所以我要到國外的自由環境，那兒有人可以幫我解釋或跟我討論這個東西，我才能知道我在做什麼、在想什麼。



3

一處我們的基地

以台灣為一個研究的基地，去研究一些台灣現象、台灣學、台灣的都市現象，在這個過程中，何時開始成為大宗的趨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就算是二十年前，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贊助了一個設計工作隊到台灣來，也未曾像今日，讓耶魯大學、香港大學、肯塔基大學、雪城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都願意來台灣，來研究台灣學或台北學，這件事情可能說明了台灣作為一個全球裡的地方性都市，具有特殊的肌理跟文化，這使得建築可以被研究。我的意思是，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座城市，有如此特殊的歷史，這是使今天的台灣到處有後工業基地可以談，從華山到松菸再到台北機場。其中包括 1975 年蔣介石去世，致使信義計畫區預定地移到松山，原定位置成為今日的中正紀念堂，與西門町遙望。

現在，我們談空總適不適合做個日本的六本木之丘，這使得台灣的或者台北的城市史成為一部活的人文地理，這可以用來討論建築，也可以用來討論各種權力的展現。例如台北機場，我們可以看到工業的痕跡、殖民的痕跡、試驗建築的痕跡，也可以看見主張保存的勢力與地方力量的興起，這也讓我反思在各種意識形態的競爭中，是不是讓她保持現狀是對歷史最好的交待？像這樣的好問題都得以被拿出來檢討，這也吸引了全

球的幾所好學校願意來研究台灣、台北。我並不認為台北是全球裡唯一具有這種特殊性的城市，然而台北城市的重層歷史，留下了許多後工業基地，讓今日的台北充滿魅力。Rem Koolhaas 就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中，點出他為什麼要到台北市做設計案：「台北是個滿貫生活能量與街道活力的亞洲城市。（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我們得以將劇場與夜市並置，創造夜生活的第二迴圈：夜市上『坐著』一座劇場。文化因而成為作品底，與商場生意、城市生活等等成為我們的『涵容』。」

一處沃土

因此，台北可以是一處沃土，滋養城市、文化、建築的國際研究。在三十年前，我們只能單行道往歐美去學習，而現在可以是雙向的交流學習。我並不認為今日是因為亞洲興起或中國崛起，我們台灣才被注意到，但在這個雙向的過程當中，台灣的輸出，尤其是國際人才，是這三十年來最明顯的改變。於是讓我們回來談建築教育，我們在處理設計教育或者專業（不只是職業），老師應該如何教，學生能學到什麼，這是持續該提出的問題。

以蘭花屋為例，一開始從來沒有任何外國友人對台灣有興趣，這才讓我察覺到我們需要重新認識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只是想做一件事，就



- 3. 交大建研所蘭花屋工作團隊的師生，參與巴黎遊街活動。
- 4. 交大建研所學生在巴黎營建蘭花屋的過程。
- 5. 交大建研所師生參與耶魯大學建築學院的設計評圖。
- 6. 交大建研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台北設計工作營，在 URS21 的交流評圖。
- 7. 交大建研所師生與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建築學院院長 Michael A. Speaks 合作的設計工作營「日日夜夜為台灣 All Taiwan All The Time」。
- 8. 交大建研所學生的設計評圖。



是對建築教育的本質和做事情的方法、態度的改變。例如我覺得綠建築不是醜建築，我想探問綠建築的機會，檢討為什麼魔法學校、綠房子無法對社會產生真正的影響力？到底是哪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而蘭花屋在各方面表現的成功，主要吸引我的，是她改變了我對建築教育的看法與做法。這關於建築與社會的互動，關於怎麼參與、怎麼學習 -- 尤其是建築如何被學習，這對老師來說，是建築可以如何教，對學生而言，是建築可以如何學。

一段陌生化的過程

建築的學習先是進入一處地方，然後必須回應這個環境裡待處理的狀況，同時去創造一種空間經驗。因此在建築教育過程中，無論挑在何處進行，只不過是藉著這些環境的狀況學習。所以「移植」最重要的意思，以蘭花屋為例，是一段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過程，也就是「西遊記」。所以我們的學生在這裡什麼技巧都學會了，卻要到了國外才突然能夠綻放光彩，在那裡，他被逼著用英文重新思考用中文時理所當然的事，他被逼著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解釋他究竟在做什麼，當他所處的學習機構完全不一樣的時候，有時候他突然會開竅。當然，反過來說我們也應該檢討，在美國的學習過程，老師往往先鼓勵學生嘗試，然後與學生一起討論如何達成的方法，而我對台灣的建築教育倍感挫折的部分，是我們給學生的負面壓力過大，這也許跟我們從小接受孔孟教育有關，老師的威權一直加在學生身上，我認為這是造成一些學生出國留學後才能綻放自己的光芒，因為他們在台灣學了扎實的基本功夫，在國外獲得開放的思想空間與表現自我的機會，這就是移植最重要的目的。

我最感興趣的則是在移植過程中，各式各樣的交流所帶來的學習經驗。從過去參與國際競圖、

景觀總顧問、城鄉風貌規劃的過程中，我理解到：在建築教學中，發現教明星建築師或天才建築師，以及在設計裡擠壓出獨特性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有時必須做一個非常平凡（平實）的設計，甚至有些設計僅只能是環境的整理。當我思索著如何將蘭花屋作為一個實品屋，行銷一種生活的方式，我的真正用意，是創造一個很容易被拾獲想法與想像的學習空間，這樣的蘭花屋所提供的，是如何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這便是蘭花屋教會我的事。

一個對教與學的思考

對我而言，「教」是 exchange 勝過是 teach，應該是彼此學習（learn from each other）。我一直厭惡把事情簡單化、用威權來教建築。很遺憾，我認為這是在台灣社會裡一直在發生的事情，包括保存被化約成不由分說就原址保留，樹一棵都不能砍就叫做生態。我厭惡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做的事情，簡言之，就是教育我自己，這也就是我為何從孫猴子開始談建築。

我需要到國外一個開闊的環境與沃土，讓我重新思考建築。同樣的道理，我透過這些人如何看台灣，讓我思考如何教建築。我沒興趣重複做過去已經學會或做過的事，所以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我必須持續換基地、換環境、換主題，透過與不同的人交流學習。所以我非常享受在交大人文社會學院裡的建築研究所，教與學。■

注釋：

1. 本文根據2015年3月6日星期五14:30 - 16:00，在新竹市交通大學人社一館院長辦公室，許麗玉訪談曾成德的記錄，由許麗玉整理，曾成德修改後，完成於2015年3月20日，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78期。